

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

三 苏

康
震
著

中
華
書
局



第一讲

人见人爱苏东坡

在中国古代历史上,有不少父子兄弟并称的名人。比如三国时代的“三曹”——政治家、文学家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、曹植;西晋时代的“三张”——诗人张载、张协、张亢兄弟;明代的“三袁”——文学家袁宏道、袁中道、袁宗道兄弟;还有唐宋八大家中的北宋“三苏”——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。人们一般称苏洵为老苏,苏轼为大苏,苏辙为小苏。

与其他父子兄弟并称的名人相比,三苏的知名度最高,三苏当中又以苏轼的名气最大。那么,与其他唐宋七大家相比,苏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?一言以蔽之:人见人爱。具体而言,有四大可爱之处。

名震宇内的文艺全才

第一,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全才与天才。何以见得?在诗歌领域,苏轼与弟子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,被公认为宋代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;在词的领域,与南宋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,被公认为豪放词派的开创者与代表作家;在散文的领域,与自己的老师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,是宋代散文最高成就的代表,人们评价他们的散文风格是:“欧文如潮,苏文如海”;在书法的领域,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苏黄米蔡”,名列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;在绘画领域,他是宋代“湖州竹派”的代表人物,擅长画枯木、怪石、墨竹;在学术思想领域,他是宋代三大学派关学、洛学、蜀学之蜀学的代表人物;此外,苏轼在史学领域也颇有创见。一个人一生如果有这其中一项成就,也足以骄傲了,苏轼却在这许多领域同时取得卓越的成就,他不仅有才华,是个人才,还是个天才,更是个全面的天才,这怎么能不令人尊敬,怎么能够不人见人爱?

天才加全才,这就是苏轼人见人爱的基础。苏轼的这个特点,在八

大家当中具有唯一性,在古代众多的文学艺术家当中,也极为罕见。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、苏辙这七个人,在文学以外都有所长,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像苏轼那样全面占有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,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据不完全统计,苏轼为我们留下二千七百多首诗,三百多首词,四千八百多篇文章,数量、质量均居北宋著名作家之首。他去世的时候才六十六岁,如果从二十岁算起,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创作如此之多的作品、精品,真是一个奇迹。

正因为如此,他的朋友与弟子们给予他极高的评价。

宋代著名诗人、文学评论家吕本中认为苏轼:“自古以来,语文章之妙,广备众体,出奇无穷者,唯东坡一人。”(《童蒙诗训》)苏轼的弟子,大诗人、大书法家黄庭坚对苏轼的书法艺术给予极高的评价:“翰林苏子瞻,书法娟秀”,“于今为天下第一”(《跋自所书与宗室景道》)。“挟以文章妙天下,忠义贯日月之气,本朝善书,自当推为第一”(《跋东坡墨迹》)。

举个例子。历来写庐山的诗,谁最有名?李白的《望庐山瀑布》:“日照香炉生紫烟,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写得太好了!你要再写庐山的景色,还怎么超过他?很难!但是苏轼来写,依然会有新意。他的《题西林壁》说: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写得更好!避开直接描写庐山,选取了一个思考的角度。读李白的诗,我们神往庐山;读苏轼的诗,我们神思庐山。读李白的诗,让我们激动,让我们激情澎湃;读苏轼的诗,让我们成熟,让我们思绪万千。这就是天才的作品,不写他人想到的,只写他人想不到的。关于庐山的诗太多了,最有名的两首属于唐宋时代最有名的两位诗人,这两首诗写出了两个时代的性格(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)。近代大诗人,京师大学堂教习(教授)陈衍认为,这首诗“有新思想,似未经人道过”(《宋诗精华录》)。

正因为如此,宋神宗虽然不满苏轼的反对变法,将他贬往黄州,但还是深深折服于苏轼的文学艺术才华。神宗在宫里吃饭的时候,如果停下筷子开始看书,宫人都知道,这一定是在看苏轼的诗文,神宗看着看着会突然感叹:“奇才,奇才!”一次,神宗与身边大臣议论古今人物,问苏轼与哪一位古人比较相似。大臣回答说,与李白比较相似。神宗想了想,



说：不对。李白有苏轼的才气，却没有苏轼的学问。我们姑且不评价李白与苏轼孰高孰低，一个文人能够得到皇帝这样的肯定，而且是在他被贬黄州之际得到这样的肯定，充分说明苏轼在北宋文坛的崇高地位。

苏轼的文学艺术才华，在当时的外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力。苏轼的好朋友张舜民奉旨出使辽国，在辽国的馆驿中，看到墙壁上刻有苏轼的诗作《老人行》。来到书店里，也看到有苏轼的诗集在售卖。张舜民非常感慨，题诗云：“谁题佳句到幽都，逢著胡儿问大苏。”（《淠水燕谈录》）没想到在国外也能看到苏轼的诗句，看来连外国人也喜欢苏轼啊！后来苏辙奉旨出使辽国，辽国大臣们也纷纷打听苏轼的情况。苏辙很有感触，写诗给苏轼说：“谁将家集过幽都，逢见胡人问大苏。莫把声名动蛮貊，恐妨谈笑卧江湖。”（《坚瓠集》）来到辽国，人人都在打听你的消息，你的大名在外，将来想要隐退江湖恐怕就难了。

其实，不仅仅是朋友、皇帝、外国人的评价高，就连他的政敌、审讯他的法官，对他的评价也很高。宋人诗话《甲申杂记》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天下之公论，虽仇怨不能夺也。李承之奉世知南京，尝谓余曰：昨在侍从班时，李定资深鞠苏子瞻狱，虽同列不敢辄启问。一日，资深于崇政殿门忽谓诸人曰：“苏轼，诚奇才也。”众莫敢对，已而曰：“虽二三十年所作文字、诗句，引证经传，随问即答，无一字差舛，诚天下之奇才也。”叹息不已。

说的是苏轼因为涉嫌在诗文中讥讽皇帝、新法，被御史台抓起来审讯，审讯他的法官是权御史中丞（相当于国家监察部部长）李定。李定为人严厉而刻薄，他将苏轼过去数十年所写诗文全部翻出来，细细审问苏轼，这些诗文中，究竟哪一句哪个字有讥讽朝政之意。那真是苏轼命悬一线的时期，大臣们都噤若寒蝉，每天上朝都不敢过问苏轼的情况，离李定远远的。一天，李定在崇政殿门外与众大臣一起等待上朝，忽然对大家说了一句：“苏轼真是奇才！”大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都不敢吭气儿。他看大家没反应，停了好一会儿，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已经过去二三十年了，他自己所做的文字诗句，引用的经书、传记文字，即问即答，

无一字有差错，真是天下的奇才。”说完叹息不已。

人人倾服的士林领袖

苏轼的第二个可爱之处，在于他是士林的领袖，也就是知识分子的领袖。领袖有两种，一种是刚性的，一种是柔性的。国家元首、军队总司令，这是刚性领袖。精神领袖、士林领袖，这是柔性领袖。一位士林领袖，应该有巨大的声望，超强的人气，强烈的凝聚力。唐宋八大家中，不少人都算是某一方面的领袖。如韩愈、柳宗元，就是古文运动的领袖；如王安石，是改革变法的领袖；苏辙做过副宰相，也算是政治领袖；欧阳修是大文学家，又曾做过副宰相，既是政治领袖也是文坛领袖。至于曾巩、苏洵，都不曾有过领袖的地位。

与这七大家相比，苏轼这个士林领袖有其独特之处、可爱之处。首先，苏轼在政治上影响力大。他曾在中央担任如吏部郎中、起居舍人、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、吏部尚书、兵部尚书、礼部尚书等职，在地方长期担任行政长官，如密州知州、徐州知州、湖州知州、登州知州、杭州知州、颍州知州、扬州知州、定州知州。在北宋朝的党派斗争中，他又是“蜀党”的领袖^①。综合这两方面来看，他算是一个政治领袖。但这不是苏轼领袖的主要内涵，在北宋，苏轼主要是一位杰出的士林领袖，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。他门下有苏门四学士、苏门六君子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：“孔子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、乐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”也就是说孔子门下有三千弟子，最杰出的有七十二位。苏轼教授、教导过的弟子肯定很多，但是真正为大家公认的最有水准的还是这四学士与六君子。这个组合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与苏轼在文学艺术方面声气相投，更重要的是他们仰慕苏轼的道德品行、人格修养与立身为政的原则，他们愿意凝聚在苏轼的周围，成为一个君子的组合、道德的组合、文学的组合。六君子当中，黄庭坚、陈师道擅长诗歌，是北宋诗歌巨匠；秦观是

① 宋神宗、哲宗时期，朝廷有王安石的新党与司马光的旧党两大派。旧党中，又分为三个政治派别：一派以程颐为首，他的籍贯是河南洛阳，这一派被称为“洛党”；一派以苏轼为首，他的籍贯是四川，被称为“蜀党”；还有一派以司马光提拔的谏官刘摯为首，他是河北东光人，属古代河朔地区，所以被称为“朔党”。



一代词宗,并擅长散文;晁补之擅长诗词;张耒擅长诗歌、散文;李廌擅长散文,他们都是北宋著名的文士。北宋的文坛与文人群体,因为有了这个组合而光芒四射。四学士与六君子,也成为后代文人向往的理想化的文人群体。

在这个组合中,苏轼士林领袖的作用是明显的。他对于自己这个领袖的地位,有着高度的自觉。他说:“文章之任,亦在名世之士,相与主盟,则其道不坠。方今太平之盛,文士辈出,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。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,故不敢不勉。异时文章盟主,责在诸君,亦如文忠之付授某也。”(《师友谈记》)意思是说:文章事业,要靠一代代人主盟相传,才不会衰落。当今太平盛世,文人辈出,必须要有所宗主,才能使文章事业兴旺发达。昔日欧阳公将文坛盟主的重任交付给我,我不敢不勉力为之。将来文坛盟主的重任还要拜托更年轻的一代,就好像当初欧阳公托付给我一样。

文坛盟主、士林领袖的职责重大,要有盟主的风范,要尽到盟主的责任与义务。晁补之写了一篇《恼吾庐赋》,苏轼读后觉得晁补之才气不凡,不过文章也有点儿小小的瑕疵:华丽有余而平和不足。苏轼认为,一个年轻作家开始创作时,最好是以平和为主,然后再追求华丽新奇,这才符合创作规律,对他本人发展也有好处。但苏轼是晁补之的老师,年长十六岁,如果直接指出他的不足,也许会挫伤他的自尊心与进取心。苏轼犯了难,寻思了一会,他提笔给黄庭坚写了一封信,信中说,希望自己的这些建议,能以黄庭坚个人意见的方式,委婉地告诉晁补之。因为黄庭坚与晁补之是同辈关系,有些话说出来比较方便,不会挫伤晁补之的锐气。晁补之如果不服气,也可以与黄庭坚争论、切磋,如果换作苏轼,晁补之就可能碍于苏轼师长的身份,不敢争辩。可见,士林领袖并不就是高高在上、颐指气使,首先要善于体察人心,对待后进之士要用心良苦。

李廌初到京师游学,一直科场不利,他很着急,于是穿梭于权贵之门,频频投文献诗,时时遭人轻视,惹人白眼。苏轼很欣赏李廌的文章才气,却不赞成他这种“朝扣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”(杜甫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)的做法,便以长者的口吻劝导他说:你天分很高,定有出头之日,最要紧的是循序渐进,决不可轻浮躁进,做有伤名节的事情。李廌入

京以来见过不少巨公大卿,却没有这样真诚地关心过他,因此心中十分感激,此后便常常以苏轼的劝告引以为戒。

苏轼不仅在精神上鼓励他,也给予他很多实际帮助。李廌连年科场不顺,经济上十分窘迫。宋神宗元丰八年(1085),苏轼刚刚结束在黄州的贬谪生活,将赴常州。有位朋友特意给他送来十匹绢、一百两丝作为安家费用。这天正巧李廌前来拜谒,苏轼知道他家境贫寒,家中几位长辈先后病故,均无力安葬,便将朋友的馈赠全部转送给了李廌。

哲宗元祐四年(1089)四月,苏轼出守杭州,朝廷赐给他一匹宝马,苏轼想到李廌经济拮据,便想将这匹宝马转赠给他。转念又想,李廌家贫,说不定哪天就会卖马救急,而此马是朝廷赏赐的御马,必须写张公据给李廌,说明此马的来源才好。于是便亲笔写了一张“马券”,措辞婉转,又不至于伤害到李廌的自尊心:

元祐元年,余初入玉堂,蒙恩赐玉鼻骅。今年出守杭州,复沾此赐。东南例乘肩舆(即轿子),得一马足矣,而李方叔未有马,故以赠之。又恐方叔别获嘉马,不免卖此,故为出公据。四年四月十五日,轼书。(《赠李方叔赐马券》)

这张马券后来在眉州刻石,有拓本流传于世。

有趣的是,苏轼写完这张马券半年之后,黄庭坚又给李廌写了一封信,这封信的作用竟然是为李廌公开叫卖这匹马:

翰林苏子瞻所得天厩马,其所从来甚宠,加以妙墨作券,此马价应十倍。方叔豆羹常不继,将不能有此马,御以富贵之家,辄曰非良马也,故不售。夫天厩虽饶马,其知名绝足亦时有之,岂可求锡马尽良也?或又责方叔受翰林公之惠,当乘之往来田间,安用汲汲索钱?此又不识蚌痛者从旁论砭疽尔。甚穷亦难忍哉!使有义士能捐二十万并券与马取之,不唯解方叔之倒悬,亦足以豪矣。众不可。盖遇人中磊磊者,试以余书示之。元祐四年十月甲寅黄庭坚书赠李方叔。



这其实就是在给李廌卖马打广告,苏轼这个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。具有传奇意味的是,黄庭坚为李廌做的这篇广告,经过九百多年后,在2007年,出现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,这件《书苏东坡马券帖后赠李方叔真迹卷》,引首有张大千作水墨仙并赞辞,还有梁启超、罗振玉、黄宾虹、王国维等名家的题跋及印章,起拍价近千万。其实给这封信定价太委屈它了,九百年前那匹马都能卖二十万钱,现在九百多年过去了,这么真情、珍贵的信笺,是名副其实的无价之宝,值得流芳百世。它记录的不仅是一匹马的故事,还是一段情意、一段传奇,是苏门中的眷眷深情与友谊。

游戏人间的不老顽童

苏轼的第三个可爱之处,在于他是一个世俗方外的老顽童。什么是老顽童?就是永远有一颗赤子之心、赤诚之心。无论这个世界如何不如人意,却总是能够以热爱、喜爱、欢喜的态度,以热情的态度、乐观的态度来看世界,看他人。这样一来,这个人的身上就拥有一种特别的气质、特别的趣味,就像辛弃疾说的:“我看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看我应如是。”换言之,我看世界多可爱,料世界看我也应该很可爱吧!这其实就是一种人生态度,世界丑恶还是美好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看世界的态度是美好的。苏轼自己就说,我“上可以陪玉皇大帝,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”(《说郛》)——我跟谁都能聊到一起,玉皇大帝可以聊,乞丐收容所的穷孩子也能聊。苏辙曾经劝他哥哥跟人交往的时候要慎重,要有选择地交朋友,苏轼回答他说:“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。此乃一病。”这话听上去有点儿傻,但是生活中的我们,其实都太精明了、太聪明了,所以也就不可爱了,这时候突然有个傻傻的苏东坡冒出来,看见谁都是自己的朋友,这样的人难道不可爱吗?我们的生活中难道不需要这样的人吗?苏轼是个全面的天才,有才华有学问,这让我们崇拜他;苏轼是个文坛领袖,士林领袖,这让我们敬重他。但是现在,苏轼还是一个老顽童,是个邻家大叔,这让我们爱他,爱到骨子里。

在唐宋其他七大家的身上,有很多的特点与苏轼相似,但唯独这个特点是他们都没有的。苏轼在世俗世界与方外世界,都是一个热闹人,

一个有趣的人。比如，苏轼很喜欢吃猪肉。他的朋友佛印和尚住在润州（今属江苏镇江）金山寺，苏轼常常去探望他，佛印知道他嘴馋，就偷偷做点儿猪肉犒劳他。结果有一天发生了意外，佛印辛辛苦苦、小心谨慎地烧好了猪肉，藏在一个地方。苏轼来了，猪肉却被人偷吃了！这说明有人早就知道佛印偷偷做猪肉，但是知情者非但不举报，反而将佛印的猪肉偷了去，弄得佛印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。苏轼看到朋友尴尬的样子，即兴赋诗一首，诗云：“远公沽酒饮陶潜，佛印烧猪待子瞻。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不知辛苦为谁甜。”（《戏答佛印》）你瞧，佛印的好心与尴尬，却变成了苏轼调侃朋友的诗材，我们甚至能想象得到佛印那哭笑不得的表情。

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投入监狱，有个狱吏对他很不好，苏轼后来东山再起，在京城做礼部郎中。有一次遇到这位狱吏，狱吏很难为情，也很惶恐。苏轼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，说，有一条蛇咬死了一个人，按照地獄的法律该判死罪，但是这条蛇向阎王爷求情说：我确实有罪，但是也有功劳啊，请求以功赎罪。阎王问：你有什么功劳？这条蛇说：我有蛇黄啊，蛇黄可以入药，曾经救活很多人的性命。阎王一听，果然不错，免掉死罪吧。没过多久，又来了一个案子，一头牛用牛角顶死了一个人，也是死罪。黄牛赶紧说，我有牛黄啊，也可以入药，也救活过很多人的性命，于是将黄牛也赦免了。最后小鬼儿拉来一个杀人犯，要判死刑。这个人吓坏了，情急之下脱口说：它们有蛇黄、牛黄，我也有黄啊！阎王一听大怒，斥责他说：“蛇黄、牛黄都可以入药，这天下人都知道，你是个人，哪里来的黄？！这不是瞎扯吗？”这个人真的很囧、很囧，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没有别的黄，只是有些仓皇（黄）、惭惶（黄）和惶（黄）恐。”（《东皋杂录》）你看，这就是最高级的幽默，也是最高级的老顽童，面对昔日曾经看管自己的狱吏，为了让对方不那么尴尬和惶恐，苏轼现编了这样一个幽默故事：这是一个可以让人放松的故事，大家在呵呵一笑中，尽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。

超然物外的谪居达者

苏轼可爱的第四点，在于他还是贬谪与流放中的达者。人都有倒霉



的时候,倒霉的时候如果就是一副倒霉相,那就更倒霉了;越倒霉越应该保持轻松、从容的心情,那就比较可爱了。古代遭遇贬谪流放的文学家不少,如屈原、柳宗元、秦观等人,他们或者自杀,或者死在贬所,生命力都不强,没有后续发展空间,也没有重振生命的机会。韩愈、欧阳修的贬谪流放时间都很短,在仕途与人生经历中几乎算不得什么,也不是他们人生经历的转折点。王安石、曾巩、苏洵根本没有贬谪流放的经历。苏轼则不一样。他自己说: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(《自题金山画像》)他被贬黄州的时候四十五岁,这一贬就是四年;他被贬惠州的时候五十九岁,在惠州居住了三年;他被贬儋州的时候六十二岁,在儋州住了三年,离开海南的时候已经六十五岁了。所有贬谪流放时间,加在一起整整十年。在八大家当中,若论贬谪累计时间之长、年龄之大、次数之多、条件之艰苦,贬谪之后尚能全身而回,贬谪对创作、人格产生重大影响,所有这些综合因素加在一起,苏轼独占鳌头。贬谪流放生活,对苏轼产生了重大影响,改变塑造着他的人生与个性。

据苏辙回忆,当初苏轼曾经告诉他:“吾视今世学者,独子可与我上下耳。……既而谪居于黄,杜门深居,驰骋翰墨,其文一变,如川之方至,而辙瞠然不能及矣。后读释氏书,深悟实相,参之孔、老,博辩无碍,浩然不见其涯也。”(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)确是事实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个“大江东去浪淘尽”的苏轼,那个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苏轼,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苏轼,其实都是在经历了贬谪流放生活之后的新的苏轼。我们可以这样说,他在贬谪之前是我们还不太熟悉的苏子瞻,而在经历了贬谪流放生活之后,苏子瞻就变成了后来为我们所熟悉的苏东坡。这个改变,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,就是苏轼能够以达观从容的态度来对待贬谪流放,所以经历了这个遭遇,苏轼不会自杀,不会因身体虚弱而病死,而是顽强地活了下来,而且努力活得更好、更精彩,活出一个新的可爱的苏东坡。

苏轼被贬惠州,生活很艰苦。他的老朋友和尚道潜给他来信,为他的健康而担忧。他给道潜的回信是这样写的:

某到贬所半年,凡百粗遣,更不能细说。大略只似灵隐、天竺和尚退院后,却在一个小村院子,折足铛中,糲糙米饭便吃,便过一生

也得。其余瘴病病人，北方何尝不病？是病皆死得人，何必瘴气？但苦无医药。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。参寥闻此一笑，当不复忧我也。（《答参寥三首》）

什么是达观？就是看透了生死。道潜来信所担心的不就是死亡么？那我告诉你，在哪儿都免不了一死。这样想问题，似乎非常消极，其实是以退为进。常言说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来到惠州这个当时的不发达地区，从表面看，的确是增加了死亡的几率，但是退一步想，在哪里都有死亡的可能。这样想问题，实际上是大大降低了病死惠州的恐惧感与危机感，反过来说，也就是大大提升了在惠州生活下去的安全感与空间。在艰苦的地方，生存的空间本来就小，能够生存的理由本来就很少，只有退一步，才能给自己的生存挪出一块空间来，才能给自己继续生存下去找到更多的理由。这不是鸵鸟哲学，也不是懦夫的哲学，而是生命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境时表现出的特殊的坚强。

说了苏轼这四大特点，既让我们敬仰，又让我们崇拜，还让我们觉得可爱。那么，苏轼何以能够如此？这就是下面我们要说的。

第二讲

自古英才出少年

苏轼是个天才,但天才也是一天天成长起来的。那么,少年时代的苏轼,到底具备哪些成才的条件呢?

天赋才华,神仙中人

少年苏轼,的确称得上天赋异禀、聪慧绝伦。小时候,他在眉山曾跟随一位名叫刘巨的老师上课。刘老师讲诗歌创作,自己先写了一首《鸬鹚诗》作示范。诗的末句写得不错:“渔人忽惊起,雪片逐风斜。”隆冬时节,鸬鹚从水中飞起,渔人吃了一惊,起身看时,漫天的大雪正在随风飞舞,很有诗意。谁知小苏轼看了并不满意,他举手发言,说末句雪片随风而去,没有归宿,意脉就此中断,不如改成“雪片落蒹葭”更妙。蒹葭就是芦苇。茫茫大雪纷纷扬扬地落在一望无际的芦苇上,芦苇在风中摇曳,雪片也在风中飘洒,彼此呼应,比原诗更有韵味。可爱的刘老师一听,大为赞叹,感慨说:“吾非若师也。”我当不了你的老师啊(事载《爱日斋丛抄》)。这当然是老师谦虚的话,毕竟苏轼那时还是个孩子。但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,小苏轼的确聪明,有着与众不同的禀赋,这是一个天才成功的重要基础。

但是成功仅仅有聪明还不够,还需要不同凡响的气质与品格。苏辙曾回忆说:

昔余少年,从子瞻游,有山可登,有水可浮,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。有不得至,为之怅然移日。至其翩然独往,逍遥泉石之上,撝林卉,拾涧实,酌水而饮之,见者以为仙也。(《黄州九曲亭记》)

苏辙的描写也许有文学夸张的成分,但也给我们描绘出一个风神俊朗、风度翩翩的美少年形象,很令人神往。这说明苏轼不仅聪明,而且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飘逸放达气质,这正是天才身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。

苏轼小时候也很有勇气。他敢于质疑,不盲从师长。在家乡上学的时候,正值宋仁宗庆历新政时期,范仲淹、欧阳修、韩琦、富弼等一批新政人物声名远震。著名文人石介还专门写了一首《庆历盛德诗》,歌颂这几个人的丰功伟绩。《庆历盛德诗》流传到眉山,苏轼的老师们争相传看,小苏轼问老师诗中所写的都是些什么人?老师回答说小孩子没必要知道,知道了也没什么用。一般孩子遭了这个抢白之后,多半都不敢再开口。小苏轼却没有打退堂鼓,而是继续追问:如果这些人是天人,那当然不敢知道,如果也是凡人,为什么不能知道呢?老师们对小苏轼的话啧啧称奇,于是告诉他说:“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、欧阳修,此四人者,人杰也。”(事载《范文正公文集叙》)这个小小的经历,对苏轼未来的人生有重要影响,他后来回忆说:在幼年时候,我就知道当时在朝廷里边有范仲淹、欧阳修这些正人君子,为之折服。后来他走出四川,在京城见到了欧阳修,见到了幼年时代向往的大人物,从此成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。苏轼敢于质疑老师,这能看出他在天性里面有一种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,在当时乃至今天,这都是难能可贵的品质。

自信刻苦,聪慧狡黠

宋仁宗至和二年(1055),苏洵带领苏轼、苏辙来到成都,拜谒益州知州张方平,为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。张方平问苏洵孩子们现在看些什么书?苏洵照实回答说,打算再看一遍《汉书》。张方平可不是等闲之辈,他既是地方大员,也是大文人。他从小家里穷,买不起书,只能向人借书,但他记忆力超群,看一遍就过目不忘。所以他听了苏洵的话很不以为然,说《汉书》看一遍就够了,完全没必要再看第二遍。苏洵回家将张方平的话告诉苏轼,苏轼更不以为然,说:“你没告诉他吗?《汉书》我都看过三遍了。”(事载《高斋漫录》)

苏轼的意思是要告诉张大人,你聪明这不错,可我的刻苦也是一种天才。你看一遍就能记住,这没有什么了不起,我看两遍、三遍也能记



住,而且我看三遍与你看一遍效果完全不同。当时苏轼还不到二十岁,却显示出了让人不敢轻视的勇气。面对权威敢于不屑,这就是独立思考的勇气。我们总觉得苏轼很快乐、很渊博、很聪明,过目不忘,其实他有着异乎寻常的刻苦精神,并且不盲从权威,有自己的坚持。

苏轼也有很多鬼机灵,比如“作弊”。现在学生作弊都很蠢,传纸条、抄小抄,或者用手机等“现代科技”。这些方法在苏轼的面前不值一提——他“作弊”的手法技术含量很高,哪怕在“作弊”中,都能体现出他的聪敏与学问来。《瑞桂堂暇录》、《四朝闻见录》中,就保存了两个关于苏轼“作弊”的小故事,很有趣味,值得一读。

张方平见到苏轼、苏辙之后,对他们很欣赏,也很想测试他们一下,看看水平到底如何。于是出了几道题让两人去做,然后从门缝里看两人的表现。结果,苏辙被其中一道题给难住了,题目问某某话出自哪本书。苏辙抓耳挠腮,不知道该怎么答,于是悄悄看看哥哥,想得到些帮助。苏轼怎么办?只见他拿出毛笔,倒立着,用笔管在桌子上“梆梆”敲了两下,苏辙恍然大悟——这个出处是《管子》。张方平在门外看到这一幕,便对苏洵说,这俩孩子都是天才,老大尤为可爱。不过我觉得还是老二比较谨慎、慎重,将来必有大成。这个评价当然是指仕途而言。果不其然,苏轼仕途一直麻烦不断,最终做到了翰林学士,但他弟弟苏辙更厉害,做到参知政事,即副宰相。这位张知州不仅记忆力惊人,而且确有知人之能,在门缝外看了那么一下,就能看出两个人都有才,且发展方向不大一样。苏轼鬼机灵,苏辙没有他兄长的思路那么快,但为人更低调谨慎,适合做官。

还有一道题,是问“信礼义以成德”的出处。这句话的意思是礼义和诚信只要都具备了,那么你就具有了足够的德行。苏辙再度被难倒。苏轼想提醒弟弟,但这一次不能再敲笔管了,不过这点小困难难不倒苏轼。这时考场的小书童正好从苏轼座位边走过,给砚台里添水,添得多了,水溢出来了,苏轼佯作大怒,骂道:“小人!”话音刚落,苏辙立刻灵光闪现,想到了这句话的出处,这就是东汉经学家包贤对《论语》所做的一段注释。《论语》中,樊迟向孔子请教稼穡之事,孔子说这种事我不懂,你去问老农好了。樊迟走后,孔子说,樊迟是个小人,总问这种没意义的事。君子只要懂得礼仪,老百姓就会尊敬你。懂得了义,老百姓就会佩